

解雇患病员工 雇主道德注定靠不住

■ 舒圣祥 媒体评论员

近日,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女教师刘伶利患癌症被学校开除一事引发社会热议,经过法院一审和二审的判决,校方终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女教师劳动关系被恢复,学院人事处处长被停职。昨日兰州交大博文学院在官网发文向刘伶利家人致歉。而此时,距离法院的二审判决已过去整整两个月,刘伶利也已经于8月14日去世。面对迟来的道歉,刘伶利家人嚎啕大哭,并要求院长公开道歉,而刘伶利生前好友聂婷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其在病重时还在兰州摆地摊卖衣服筹钱治病,临终前嘱托自己常去看看她的父母。(8月23日《法制晚报》)

刘伶利的遭遇让人唏嘘不已,身患重病本已令人难过,单位再如此绝情,无异于雪上加霜。基于普遍的同情心理,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这家民办二级院校,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各种口诛笔伐与道德批判,将这家院校打上了冷血无情的标签。

在细节服务中 体现时代文明与进步

■ 李劲松 职员

全国铁路首个统一收银平台的移动支付在上海铁路局虹桥站成功上线,也就是说从现在起,花一元钱买一包纸巾,或是两元买一瓶矿泉水,乘客都可以通过刷卡手机的方式,在高铁车厢内实现“零现金”支付。目前,包括虹桥火车站100多家门店及该局开行的20趟京沪高铁列车在内,均可实现刷卡机付费的模式。(8月21日《中国江苏网》)

手机刷卡支付是一个方便简单的小动作,在铁路服务中也算是一个微小的细节。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细节,包含的是铁路服务社会大众与时俱进的新风气、新理念、新时尚、新姿态,体现的更是时代的文明与进步,这必将会给铁路的发展带来一个潜在的巨大商机。试想,铁路从原始铁老大的昂扬姿态,到如今愿意为旅客做好细节服务,体现的不是文明与进步吗?

遥想数年前,笔者便听说“手机支付”概念。数年来,年年有雷声,不见有雨下。2010年4月工信部科技司在“2010第二届中国移动支付产业论坛”上便透露,正在着手小额手机支付标准的研究制订工作。转眼间,6年时间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其实,手机支付技术上说应该早就不是问题,但一些商家就是迟迟不愿接手,想必是想吊足消费者的胃口。

任何人的耐心等待都是有底线的。倘若手机移动支付功能再不投入使用,待到有更先进的支付手段诞生后,假如手表支付、身份证支付、刷脸技术等出现后,恐怕华佗再世,也发挥不了当前手机支付的用处了。上海铁路局顺应消费者呼声,顺应时代潮流,在最恰当的时刻,在20趟京沪高铁列车上列车和虹桥火车站100多家门店推行手机支付业务,正是迎合了大众之渴望、大众之需求,更是铁路走向市场的新思维、新动力、新方法的具体体现。说明铁路服务社会的能力在提升,铁路能够掌握运用社会信息资源的本领,更能够准确把握微小事物中的大商机。

众所周知,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需要刺激消费者付出消费行为。从每一次新产品投入使用来看,敢于善于尝鲜是大多数消费者最主要的消费心态。如每次新苹果手机上市,无数爱好者排队竞相购买,更有消费者省吃俭用、攒钱购手机。因为这样的消费在一些消费者看来称得上是文明时尚消费。只有文明时尚消费,才能激发消费者前赴后继消费。而今,在上海铁路局开行的20趟京沪高铁列车上,乘客只需要开通支付宝支付、微信支付、银联支付,就可通过刷卡机付费的方式购物消费,感受高铁“智慧商旅”带来的全新体验,其中还包括当下热门的“APPLEPAY”等云支付模式,简化了旅客支付手续,也为旅客带来了实惠。能够乘坐高铁,本身就是一种时尚,若再能在高铁上增加文明时尚消费,优越感与自豪感想必是满满的,从而进一步激发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另外,手机支付这项个性化增值服务还有一个优势,当我们在自动售货机前为找不到硬币而着急时,手机支付可以很容易地解决这个问题。这次真的要为铁路及时启用手机支付功能点赞。

细节服务体现文明与进步。下一步建议铁路部门继续开动脑筋,在站车上开通手机缴费、手机蓝牙链接补票机直接补票等功能,确保通过手机支付功能真正让旅客手机成为随身携带的电子钱包,让旅客在高铁站车上始终充满科技的优越感和文明的自豪感。

此刻,校方“之前不知是癌”的回应,傻到简直就是自设靶子欢迎攻击,尽管刘老师的第一份请假条写的是“盆腔炎”。

既做出了基于自身利益的自私选择,又要宣称人性化的管理,撒了一个谎,然后要再撒一百个谎来圆,何必呢?其实,笔者倒不认为这家学校,真的如外界咒骂的那般蛇蝎心肠,如果能够预知刘老师很快会去世的后果,他们肯定会做出更符合道德标准的选择;问题是,我们现在能够看见的,学校当初预想不到,“用一点钱就可以做好的事”,学校无法提前预估。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单位,不愿意“养闲人”,或许不够高尚,但实属正常。解雇员工的权利,对企业而言是最重要的权利之一,如果机关事业单位的“吃空饷”问题,也可以在企业存在,那一定是企业无法承受之重。哪怕是解雇患病的员工,看上去很残酷,但也主要是一个法律问题,而非非道德问题。

像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开除刘老师这种事,其实还有很多,比如同样是今年8

网约车地方细则在熬什么汤？

■ 海建 媒体评论员

网约车新政发布尚未“满月”,各地仍在研究制定落地细则,在细则出台之前,有地方交通执法部门表示,仍会查处非法营运的网约车。昨天,北京交通执法总队第五执法大队在对黑车联合执法时透露,目前北京网约车细则尚未落地,私家车从事网约车工作仍算“黑车”,将面临2万以下罚款。(8月24日《新京报》)

对于网约车司机来说,“七月新政”只是第一只靴子,属地管理下的地方细则,才是亟待落地的最后一只靴子。

根据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公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网约车新政将于11月1日起实施。因此,仍有两个月的博弈期,给地方细则多方角力留下了窗口与空间。不过,运管部门的共识似乎是板上钉钉的:能打则打、能压则压。并不会如其他新政一般,在过渡期对准生证马上到手的新事物网开一面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月份刚刚去世的魏延政,在他患癌截肢最无助的时候,华为却与他终止了合同。两者唯一的区别是,前者使用了“开除”这样的字眼,而后者仅仅是不再续约。本质上并没有任何不同,只不过华为的法务团队,显然要比这家学校更会“办事”而已。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在法律层面,企业与患病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并没有障碍,企业的义务仅限于医疗期内不能解除。医疗期时间多长呢?按照《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一般最长也就两年,而实际工作年限十年以下,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年以下的,只有3个月。

因此从法律的角度说,刘老师可以享受有多长时间的医疗期,是完全可以计算出来的;只要熬过这段时间,学校不用“开除”,改用“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在法律上就没有问题。这就是现实,或许你会觉得残

因此,下面的事实就很容易理解了:并非只有北京的交通执法部门在政策空当期执行既有法规。网约车新政发布后不久,济南市交通部门就向媒体透露,在政策落地之前,执法部门仍将按照现有法律法规查处非法营运。2015年至2016年7月7日,济南已查扣近400辆网约车。山东淄博、广西南宁、江西南昌等地交通执法部门也曾公开表示,地方细则出台前,专车还是“黑车”。更激进的是兰州新政,沿袭了“限量限价”的管制思维——可若果真统一标识、甚至统一培训和摇号,把网约车管到传统出租车的老路上去,这网约车岂非成了新瓶旧酒的传统出租车?

有一点是肯定的:网约车新政之所以遵循了属地管理的原则,其实是让地方“家规”因地制宜、多听听当地市民的意见,而绝不是让地方规则量体裁衣为本地网约车打造的属地版“小鞋”。对于在网约车和传统出租车之间急于站队的可疑行为,恐怕不仅是要简政放权,更要在长远利益的立场上“简政放钱”,莫为蝇头小利而伤了分

酷,但现实从来就是残酷的。所以,针对此事,道德谴责之外,更重要的,其实是提醒我们要完善个人医疗保障。

具体又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政府兜底的层面,一个是自我负责的层面。在政府兜底上,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员工因为患病被雇主解除劳动合同,医保无法续缴该怎么办?比如新闻中的刘老师,最大的愿望就是学校能够继续把医保缴一下。因为职工医保与城居医保的不同,造成了职工医保无法由个人自行缴费,这个问题需要得到解决。

当然,解决“因病致贫”隐患,关键还在于靠自己。企业不会“养闲人”,雇主的道德注定是靠不住的,同样,指望全由国家兜底也是不现实的,必须自己为自己早做准备。比如重疾险,应该去买一份,其他的商业性医疗保险,在经济许可的情况下也都可以考虑。虽然我们痛恨解雇患病员工的冷血商业,但要解决“假如身患重病”的困境,还真得去拥抱商业之美。

享经济的根基。今年2月,国家信息中心信息研究部和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6)》,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分享经济市场规模为19560亿元,中国参与分享经济活动总人数目前已经超过5亿人。洗白网约车之“黑”,在去产能必然带来“转岗”、经济低迷势必影响就业的今天,或许平添更多民生意味。

网约车新政快满月了,“打黑”仍是地方运管部门的主旋律,这是让人担心的一个倾向——密室中的地方版细则,会沿袭这个摆在脸上的思路吗?须知,因地制宜的另一面,很容易让自由裁量演变为合法伤害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众固然无须对“但闻楼梯响”的地方细则太担心。但,主管部门不能不对各地呈报的细则不上心。严防偏袒、禁绝“私货”,这是审查地方版细则的底线原则。

一辆网约车,可能对应着一家灯火。网约车地方细则熬的这碗汤,但愿能调众口、解百忧,起码,不至于闻出怪味坏味来。

大件垃圾何处去 循环利用方解忧

■ 张全林 职员

住房装修、搬迁、居民废旧家具更新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大件垃圾,这些大件垃圾的处理正成为难题。居民不知如何处理、随意丢弃,摆放在公共区域的无主大件垃圾不断增多。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2002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78.6%的受访者遇到过处理大件垃圾的困扰。(8月23日《中国青年报》)

根据《大件垃圾收集和利用技术要求》定义,大件垃圾包括废旧家具(床垫、沙发、书柜等),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还包括其他的大件垃圾,如厨房用具、陶瓷、玻璃、金属、橡胶、皮革等各种大件物品。大件垃圾由于复杂多样、含有各种有毒有害物质、不易降解、容易成为污染源,形成二次污染。此外,大件垃圾体积大,占用土地,因此,长期堆放大件垃圾会造成危害。

大量的大件垃圾应该属于再生资源,以往多是与其他生活垃圾一同压缩然后填埋,既影响市容,也浪费资源。各地环卫部门也为此想过很多办法,包括设立大件垃圾临时堆放处,让市民自行搬去弃置,或者打电话通知环卫工人上门支付适当费用搬走。不过搬来搬去,还是垃圾。

推进大件垃圾回收利用处置工作,重点是建立回收体系,与处理企业形成无缝对接,这就需要研究制定支持政策,以保障垃圾回收处置企业正常运行。

大件垃圾处理应该建立完善的处理机制,方便市民参与。如建立企业和社区的对接机制,不仅给居民和环卫部门提供了诸多便利,也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可设置大件垃圾处理的热线电话,市民要处理大件家具只需拨通一个统一的号码,热线即可根据地址通知所属区域环卫部门及时回收。对于私自丢弃大件垃圾的,环卫管理部门在清洁巡查时发现,理应上门要求依规缴纳处理费用。

应该明白垃圾处理是需要成本的,凡淘汰大件垃圾的,不仅需要支付搬运费用,还应该支付处理费用,按量缴费。国外如德国、日本等国家对于大件垃圾丢弃处置都有相关规定并交纳相应费用。

保障大件垃圾及时得到处理,有必要引进企业服务模式,运用企业本身的盈利机制来处理垃圾,将会减少社会支出。垃圾本身是消费行为的产物,垃圾的循环利用应当从生产与消费的过程中提取成本,纳入到相关经济政策中调节,建立税收反哺机制,真正让垃圾处理变成产业,才能破解大件生活垃圾造成的困扰。

“干实事”是摆脱手机依赖症的最好途径

■ 霍寿喜 职员

8月,中国高校传媒联盟在来自全国的1937位大学生中发起投票,55.06%的大学生表示暑假基本“宅”在家刷手机度过”。67.19%的受访者承认自己有手机依赖症,其中认为自己“重度依赖,手机就像身体的一部分”的大学生占9.46%。(8月24日《中国青年报》)

今年暑假,笔者参加过几次“升学宴”,在等待上菜的一段时间,大人们围着桌子聊得很投机,年幼的孩子们也快乐地在桌子中间穿梭。最没有声音的当属前来参加宴会的一些大学生模样的客人,无论大人说什么,孩子闹什么,他们都专注于低头玩手机,也因此,他们的嘴巴除了吃喝外,很少与人说话。

显然,这些大学生模样的人或多或少都患上了手机依赖症。也不能全怪这些年轻人,实在是手机里的东西太吸引人了,网络手游、网络社交、网络直播、微信朋友圈……许多大学生的精神世界都“寄居”在手机承载的丰富多彩的内容里。因此可能会厌恶社交,正常的作息被打乱,人生活也被网络所浸染,对于现实世界和身边人缺乏足够的关心和关注,等等。

怎样才能人有效摆脱手机依赖症?最好方法就是干点实事,另寻精神依托。

对大学生而言,最“实在”的事就是学习。比如新闻中的代晴,因为有出国求学的愿望,今年暑假将“二战”雅思。她坚持每天7点左右起床,9点开始听力练习,紧接着做阅读,状态好的话就继续写作文。一个暑假进行的模拟考试就达几十次。每天晚上,她都会学习到12点。如此充实的学习生活,怎么可能患上手机依赖症呢?

其实,大学生要自始至终地处于“干实事”状态,就要制定大学四年的整体规划,包括课余时间的规划,长短假期的规划。一个好的规划是大学生不虚度生活,不荒废大学时光的起码条件,也是摆脱手机依赖症的有效途径。

此外,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含暑假打工)也是摆脱手机依赖症的好方法。

我有一位亲戚家的孩子,高中时就迷恋游戏,上了大学后还是游戏不止,寒假回到到哪都是玩游戏,亲戚两口子烦死了。去年暑假,我给这位游戏迷介绍了一个临时工作——在“电脑城”一家软件公司里从事售后服务工作。到客户家安装游戏软件成了经常性的工作,渐渐,自己的游戏瘾反而小了。暑假之后,那个昔日沉迷于游戏的大男孩竟然不玩游戏了。

应该说,电脑游戏瘾症比手机依赖症的“病症”更重,干实事可以消除游戏瘾症,自然也一定能击退手机依赖症。



东戴河的快艇生意究竟是何套路

■ 邓海建 媒体人

近日,网上流传的骑快艇被宰、服务员强行揽客砸车等帖子,让辽宁东戴河旅游区陷入舆论漩涡。陷入旅游信任危机的东戴河景区暴露出自然生长下的诸多问题,经营主体小且散乱、拉客宰客已成潜规则。“如果再这么搞下去,以后谁还会来?最后害的还是我们自己。”30多岁的止锚湾村农家乐老板江涛(化名)感叹,靠宰客发展旅游无异于杀鸡取卵。(8月22日《新京报》)

摩托艇说好100元一圈,结果一回岸价格就瞬间翻番。这哪是说道理的生意呢,不过是地痞流氓拿快艇当打劫的门面罢了。业内人士称这都是套路,而且70%摩托艇驾驶员都是无证驾驶。光天化日之下,挨宰的又非三两个人——不管这是原始景区还是规划景点,如此堂而皇之靠水抢钱,怎就没人问没人管?

杀鸡取卵的把戏,涸泽而渔的心思,其实大家都了然。农家乐老板都知道的道

理,行业监管者自然不会真糊涂。东戴河新区管委会曾回应称,“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一两件坏事就可能‘一条鱼腥了一锅汤’,我们的确需要加强治理!”不过,最新的解释,却是——东戴河旅游业此前不是主导产业,6年无规划。针对摩托艇宰客频发现象,目前管委会研究,明年将全面取缔摩托艇项目。明年暑期之前,东戴河沙滩旅游的详细规划也有望出台。可问题是,有没有规划跟有没有整治违法乱象之间,有什么逻辑关联呢?快艇上的狮子大开口,就差直接伸手到你兜里抢钱了,这跟地方景区规划是否健全显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事。

出事儿了,就“全面取缔”,而不是梳理价格、整顿产业,这算不算因噎废食呢?东戴河的“坑”有多大、“水”有多深?三年前的旧帖和三年后的遭逢,足以构成研判当地旅游市场生态的事实链条。拦路的、砸车的、宰客的……舆情喧嚣之前,地方旅游部门或市场监管,究竟有怎样的作为?从青岛大虾到哈尔滨天价鱼,似乎隐喻了少

数景点的明规则:景区价格问题,基本是“民不告官不究”、甚至是“舆论不倒逼则官不究”,游客势单力薄,又往往是“外地散户”,吃哑巴亏是常态,较真的终究是少数。只要权力监管袖手旁观,这场角力的江湖,注定是黑店永霸霸主。

宰客发财,透支的是中国旅游业的生命力。各种A级景区,尚可“摘牌”来吓唬,对于东戴河这种自然生长的景区,看起来还真拿它没辙。只是,旅游局没办法的事情,工商行政管理及司法部门,莫非也爱莫能助了?宰客事件是地方旅游的信任危机,但如果往深层追究,其实是地方市场业态的秩序危机、执法部门的公信危机。

“天地可欺客莫欺,客是商家食和衣。”这话当然不仅是对景区说的,更是对城市管理者说的。东戴河的快艇生意是何套路?答案毫无新意。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疯狂快艇挣的这点黑钱,对于城市形象宣传费或透支的经济发展力来说,塞牙缝都不够了。